

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PIONEER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J. Epstein 爱泼斯坦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作者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译者 孟胜德



中国和平出版社

1126350

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爱泼斯坦 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土城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胶印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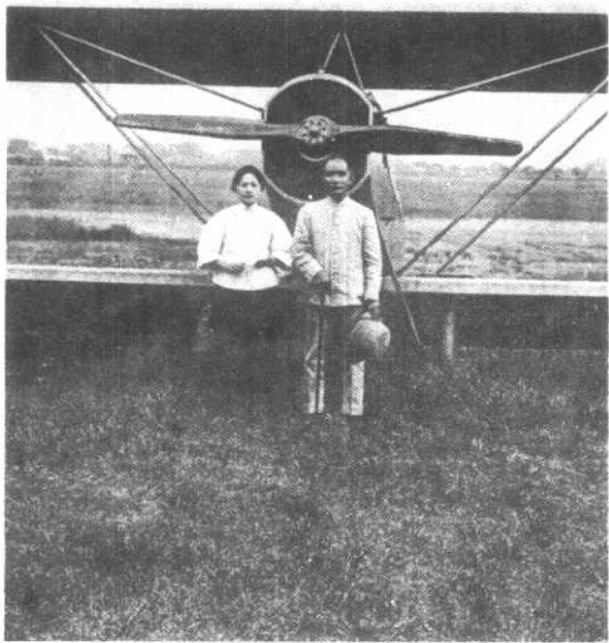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开 印张：2 字数：40千

1987年11月第一版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国际统一书号：ISBN 7—80037—007—0/K·1

统一书号：11481·032 定价：1.25元



1923年夏天，宋庆龄与孙中山视察广州停机场，在我国自己装配的第一架飞机前留影。



1938年，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合影于香港。自右至左：廖承志、法朗斯、克拉克、宋庆龄、廖梦醒、邓文钊、爱泼斯坦。



1978年，宋庆龄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爱泼斯坦在一起，共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左起：爱泼斯坦、李伯悌、宋庆龄、罗叔章。

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1986年11月在日本东京和神户的讲演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你们所选的题目很好，很合时宜。这个选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这是我未能做到的。我本打算利用一段时间专门从事有关背景材料的研究，以讲好这个题目，不幸这一工作因病而中断。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只能讲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实，以及自己一点肤浅的看法，也许能供作参考。

现在，让我们就这一题目，提纲挈领地谈一谈关于这两位伟大人物的有关事实，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吧。

孙中山和他的时代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逝世于1925年。也就是说，他的一生跨越了19世纪的后半部分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一。

孙中山出生时，中国正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这是中国 2000 多年封建帝制的最后一个朝代。由于

1840年至1842年和1856年至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当时西方列强在工业和军事方面已经相当发达，而中国在这些方面仍处于中世纪水平。列强通过这些战争，把一个独立的、在本地区占优势的中国，强行推向了殖民主义奴隶制的深渊。

孙中山逝世时，主要是由于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斗争的结果，中国已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制国家，并且已经过了差不多15个年头。然而这一政治变革并没有像其倡导者所希冀的那样发展，它既没有恢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地位，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现代经济的发展。相反，外国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渗透和经济上的钳制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加剧了，而封建关系——地主阶级对土地和对全国政治的权力——实质上原封未动。

因此，孙中山临终前在中国从事一场新的、更为深刻的革命。这不仅仅限于政治形式上的不同，而是触及到中国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彻底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在争取进步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障碍。这是孙中山以及一切真正爱国者的愿望。

孙中山去世于1925年，未能活着看到这场革命的曲折的但却是不可遏止的发展，也未能看到直至

四分之一世纪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所取得的最后胜利。然而他的持久的历史性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到胜利的曙光并为之欢呼，他不仅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坚定和乐观，并且能够勇往直前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即使在进入老年，仍以富于青春的活力帮助中国历史走上新的道路。在这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重大变革强烈地激励着他。

国外的一个重大变革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包围和瓜分中国的企图，使中国的革命免于国际上的孤立，并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前景。另外两个国内的重大事件是1919年遍及全国的五四反帝运动风暴和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的成立。孙中山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联盟中的盟友，并欢迎他们去唤起和组织已成为一股新的巨大力量的工农大众，使政治和军事斗争增添前所未有的威力。

在中国，现代化只能通过革命来实现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讨论的题目是现代化，但却讲了一大通革命，一场持续深入几十年的革

命。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在于：中国只有首先实行革命化，然后才能实现现代化。

一些国家的情形并非如此。例如，19世纪后期的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俾士麦时代的德国，或者更早些时候（18世纪），彼得一世时代的俄国，或弗雷德里克三世时代的普鲁士。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通过上层的改良，而不是通过人民革命来实现的。以上所有这些范例，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它从年代和地理位置上离我们是那样近）受到了中国早年现代化倡导者的羡慕、研究，甚至嫉妒。其中有些人是清朝政府中的保守派官吏，如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他们的兴趣主要在军火工业，无意于改革旧的管理体制及观念。还有一些时运不佳的自由君主立宪改良派——推行戊戌变法（1898年）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他们的改革计划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并且说服了年轻的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在全国推行他们的变法主张。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些尝试的失败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国情不同于外国，而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实例正是当时中国改良派想要仿效的。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政治方面，当时中国已经失去了许多主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

国领土的瓜分已经开始。几十年来，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去维护民族的生存与复兴，反而大肆出卖民族利益。

在经济方面，中国没有帝国主义列强在现代化前所具备的工业乃至商业的资本主义增长，也没有一个相应发达的资产阶级。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正处于对外扩张的鼎盛时期，它们急需寻求像中国这样巨大肥美的进行剥削的地盘，于是它们用枪炮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人民是英勇的人民，爱国的人民，具有创造性的人民。这一点早已为他们的行动反复证明。但上述种种障碍像大山一样挡住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形成的，更不要说把中国建成资本主义国家了。

那些企图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祖国的中国人在这两座大山前碰了壁。于是，在20世纪末他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路，而只能走乔治·华盛顿式的共和革命之路。历史发展到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人们又不可避免地得出了另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民必须从乔治·华盛顿转向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

孙中山在其早年做了第一次转变，在其晚年又转向后一种结论。做出这两次选择并非由于他反复无常，而是由于他从革命的实践中吸取了教训。他是一个不屈不挠脚踏实地的革命者，不断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之路。

孙中山的出身和成长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既是革命家，又是现代化的倡导者。推本溯源，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其个人根源在哪里呢？

孙中山出身于中国南部广东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继承了当地人民长期以来反对满清统治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当地各个阶级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由于出身贫寒，他还特别痛恨地主、财主对穷人的压迫。一个曾经参加过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老年亲戚经常给他讲起当年暴动的情景。这使他从童年起就对这次武装起义充满了敬仰之情。这次革命不但几乎推翻了满清皇帝，还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等政治纲领。

然而这在当时不过是梦想而已。实际情形是，在沿海的广东省，由于异族的侵略和国内的腐败统治，孙家的几个儿子和当地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

既缺土地，又无职业，只得出洋谋生。孙中山的哥哥去了夏威夷。在那里，他先是做苦工，后来自己经营了一爿小店，再后来发展成一个大牧场主，成了资产阶级的一员。资产阶级在当时的中国是个新生的阶级。孙中山是在夏威夷，后来又到香港，接受了西方的教育。

从那时起，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吸取了三个方面的东西。

其一是他永远忘不了自己苦难的农民出身。

其二是对出洋谋生的中国移民，即所谓“华侨”的景仰。在国外较为先进的环境中，一些华侨脱离了贫穷和苦役般的劳作，逐渐在经济上发达起来。然而由于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又在国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所有的华侨在国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和凌辱。因此，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祖国做后盾。这不仅为了故乡和爱人，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孙中山思想的第三个来源是当时留学生的思想。他们中许多人都具有一些文化背景和经济能力。他们出国是为了学习。在国外，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和先进世界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是落后了。他们渴望学成归国，服务于中国的振兴和现代化事业。许多归国留学生还意识到，如果不实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他们所想往的

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

集这三方面的渴望与感情于一身，作为历史的代表，勤于思考和英勇无畏的年轻人孙中山决心变思想为行动。他动员并组织了一切可以联合的人投入了改革的行动。这三方面力量的融合，为中国的改革造就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因为孙中山所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当时几种历史潮流的结合体。

年青的孙中山接触了西方现代的东西，这使他冥思苦索，如何才能把这些先进的东西带回中国去，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那时他还不到20岁。他之所以选择了学医正体现了这一点。当他还是个学生时，就曾向家乡所在的县政府建议实行新的耕作和养蚕方法以造福桑梓。1894年，在他获得医学学位2年之后，他还为主张长途跋涉，从地方到中央，到达华北去见李鸿章，这个曾提倡建立国防以及其他工业的一品朝官。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现代的农业技术。他所提出的这些措施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全面缩小中国与外国之间差距的先导。正是这一差距使中国在外国的侵略面前不堪一击。

然而他的爱国主张被置之不理。孙中山从此看透了清政府的本质。它不可能实行任何改革与进

步,只能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自那以后,他义无反顾地致力于彻底推翻满清政府的斗争。

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一目标终于在1911年实现了。以后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然而不久就让位给军阀兼政客袁世凯。他放弃了总统位置,希望此举能稳定局势,避免内战。他认为,献身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刻已经到来,欣然接受了铁路督办的职务。在当时,铁路的扩建是当务之急。他极其自豪地视察了第一条全部由中国自建的铁路——京张线。该铁路通过地势险峻的群山,为“中国铁路建设之父”工程师和创制者詹天佑所建。他还东渡赴日考察日本铁路的发展。然而不久袁世凯就背叛了民国,使孙中山对他大失所望。无所畏惧的孙中山不得不再次流亡国外,以继续他的革命活动。

正是在流亡日本期间,他遇到了宋庆龄,并于1915年和她结为伉俪,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生活。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宋庆龄吧。

宋庆龄在她那一代人中找到了 自己一生的道路

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比孙中山晚了27年;逝世

于1981年,那是孙中山逝世56年之后。无论从历史上讲,还是从个人上讲,她都属于孙中山的晚辈,并且一直活到第三代人成长起来。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与孙中山是同辈。他出身农民,后侨居国外,和孙中山一样,是中国早期赴美留学,成为一个推行现代化的归国留学生。回国以后,宋耀如先是做了基督教的牧师,后来成了上海的工业企业家。宋庆龄出生的那年,他已经参加了孙中山的政治团体。

宋庆龄的现代意识并非受教于人,而是她出生于一个现代化的家庭。她生长在“通商口岸”城市的中国资产阶级家庭,其生活方式已颇为西方化了。在19世纪9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这些“口岸”城市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在她父母的家里,从建筑形式到生活设施、家具乃至饭菜都是西式的。孩子们从小就被送到教会学校就读,学校所设的课程主要是用英文讲授的。由于宋耀如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所以孩子们也都被送到美国去读大学。然而,孩子们的父母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无意让子女久居国外,希望他们学成归来,为中国的进步效力。宋庆龄是父母这个教诲的最忠实的孩子。

她在美国求学时(1908—1913年)所写的文章中先是号召改革,辛亥革命爆发后,她又为之热烈欢

呼。在她还不到20岁时她就写道，归国留学生的使命和任务，就是按照西方的自由派传统，把中国改造成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以恢复其独立和强盛。这是宋庆龄的事业观。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比孙中山几十年前年轻时的观念要狭隘一些。宋庆龄和孙先生不一样，因她既未经受过农民的劳作之苦，也未尝过华工远渡重洋出外谋生的艰辛。她只了解城市和校园。然而这位热情的少女热衷于投身改造饱经忧患的祖国的事业，并把孙中山视为这一事业的领袖。

正是这一原因，她做了孙中山的英文和机要秘书，后来又成了他的妻子和知己。从那以后，不仅仅是宋庆龄向孙中山学习，他们还共同学习，结下了亲密的同志情谊。他们所学的东西使宋庆龄受益终生，以至孙中山逝世后，她虽然是那样年轻，却能够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几十年如一日，在空前严峻的考验面前，临危不惧，奋斗不已，直至取得空前的胜利。

对中国革命来说，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是相互需要、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一婚姻基础使他们互相忠实于对方，幸福美满。婚后，他们互相关心，同甘苦共患难，直到10年后孙中山逝世，每天都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在不懈的斗争和努力中，在1924年开始的新的革命中，他们总结出了具有决定

意义的东西，那就是，工人、农民、一个革命政党和一支为中国人民绝大多数谋利益的军队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些就没有现代化的新中国。

孙中山不断地推进革命斗争。在其被迫停顿的间隙中，他充分利用了这些时间来规划中国现代化的蓝图。

如他制定了“建国大纲”(1919—1920年)。但只要革命尚未成功，这些计划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不是革命斗争本身而是革命胜利的姗姗来迟使中国现代化一直不能实行。杰出的中国妇女领袖，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历史地肯定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拓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一位外国作家，马丁·威尔伯在他关于孙中山的论述中把孙中山的全面目标归纳为“一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共和国”(孙中山早在1897年便开始接触国外社会主义思想，并一再重申，他著名的三民主义的第三项——民生——是和社会主义相同的，尽管他在如何达到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两个现代人物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是当时中国两个杰出